

抗震救災與公民社會的想像

● 張慧瑜

2008年5月12日，四川發生黎克特制7.8級大地震，面對突發性事件，國家緊急動員，大眾傳媒扮演了格外重要的角色。媒體與國家如此親密無間的合作，達到了非常成功和有效的動員效果。尤其是地震發生後不久（5月18日），中央電視台舉辦的大型直播晚會「愛的奉獻」，把這次「眾志成城、抗震救災」的情感動員推向高潮。連1990年代以來借助冷戰想像不斷指責中國政府的西方媒體，也幾乎找不出任何質疑中國的理由，就在不久之前因西藏問題而出現的反華大合唱也瞬間瓦解。可以說，借助這次救災，中國國內變得空前和諧，國際環境也暫時逾越了冷戰想像，中國似乎終於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

對於這次抗震救災，媒體及學者多從中國公民社會走向成熟的角度來論述普通公民自發參與救災的熱情。公民社會的想像於1990年代冷戰終結之後進入中國，為甚麼直到今天才發揮威力呢？作為公民社會想像的主體位置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是本文所關注的兩個基本問題。

一 公民社會討論的語境

這次抗震救災形成了強有力的社會共識，尤其是對於絕大多數通過電視、網絡間接「目擊」災情而獲得「現場感」的觀眾來說，這是一次危機時刻的心靈洗禮。人們在這次地震中上了一次公民教育課，鍛煉了人們的參與意識，似乎預示着中國公民社會正在走向成熟。不僅《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刊物紛紛發表評論文章，指地震「震」出一個「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的模式」、國家「進行着自己的成人禮」等^①，就連帶有官方色彩的《北京青年報》也發表題為〈全民總動員見證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的評論^②：

一場新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然災害，考驗着政府、軍隊、武警在緊急狀態下的「應戰」能力，同時也考驗着中國民間社會面對自然災害時的動員和互助能力，檢驗並見證了中國公民社會的進步和成熟。

1990年代初期學界對公民社會（也稱「民間社會」或「市民社會」，對

抗震救災形成了強有力的社會共識，尤其是對於絕大多數通過電視、網絡間接「目擊」災情而獲得「現場感」的觀眾來說，這是一次危機時刻的心靈洗禮，似乎預示着中國公民社會正在走向成熟。

正是在冷戰結束的背景之下，公民社會被賦予了反抗專制的想像，中國學者開始接觸公民社會的理論，討論中國有沒有公民社會，或者說公民社會是否適應中國語境的問題。

應於西語的civil society) 的呼喚，似乎終於結出了「碩果」。公民社會成了國家抗震救災的重要力量，其中最顯而易見表現，一是民營企業踴躍捐款捐物，二是普通公民積極捐款捐血或以志願者的名義奔赴災區，這些都成為指認公民社會的正面例證。從這個角度來說，抗震救災無疑成為對公民意識的一次演練；或者說，公民身份經過十幾年的呼喚，終於可以從「猶抱琵琶半遮面」而顯影並登堂入室了。

中國大陸學者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發生在1990年代初期。公民社會理論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與1970至1980年代之交使用「公民社會對抗國家」的理論範式來闡釋東歐及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轉型有關，尤其是以波蘭團結工會為例來說明公民社會作為瓦解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一種積極力量。公民社會理論在東歐復興的背景是在冷戰後期，尤其是蘇共二十大之後，東歐普遍拋棄斯大林路線之後的修正主義改革進程，其中伴隨着商品經濟、獨立工會運動等脫離共產黨專制國家的非體制性因素，均被認為是建立公民社會的一種力量。

直到冷戰結束，這種東歐知識份子關於公民社會的論述才被西方知識界作為壓倒或瓦解社會主義專制體制的重要路徑，進而使公民社會成為對抗專制體制並實現民主化進程的良策。可以說，正是在冷戰結束的背景之下，公民社會被賦予了反抗專制的想像，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學者開始接觸公民社會的理論，討論中國有沒有公民社會，或者說公民社會是否適應中國語境的問題。

在這股討論公民社會的熱潮中，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60年代

出版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一書被美國學術界引介到人文研究領域，使得對公民社會的討論偏離了政治學的含義，而轉向對文化、媒體等公共領域的討論。在哈貝馬斯看來，「『公民社會』的核心機制是由非國家和非經濟組織在自願基礎上組成的。這樣的組織包括教會、文化團體和學會，還包括了獨立的傳媒、運動和娛樂協會、辯論俱樂部、市民論壇和市民協會，此外還包括職業團體、政治黨派、工會和其他組織等。」^③這直接影響到中國學者在1990年代初期對於「大眾傳媒」，尤其被指認為帶有民間(即非官方)色彩的傳媒能否發揮公共空間功能的討論。

此時，如何擴大公共領域並達到削弱政府職能以強化公民力量的論辯，成為呼喚公民社會的先導(當然，最終目標是政治民主化運動)。以南方諸多「都市報」為主、充當「批判空間」的媒體，在把矛頭對準問責政府的時候，卻無法處理市場化所帶來的諸多弊端。也在這種認識之下，曾經在1980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還沒有完全瓦解之時，城市市民以街頭遊行示威為表現形式的內部抗議，卻很少被追溯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先聲(這恰恰類似於最初使用公民社會的視角來解釋東歐內部的改革)。與1990年代相比，那時候公民空間的氛圍更為強大。

另一方面，在公民社會的爭論中，人們並不願意談論的是，哈貝馬斯所論述的十七到十八世紀作為理想模型的「公共領域」的討論，是在馬克思關於這個時期作為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理論背景下展開的。關於公民社會的想像背後是成熟而理性的資產階

級主體的確立。在這個意義上，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無意之中成為把被國家(不言自明的社會主義黨國體制)綁架的「人民」轉變為市場中的「個人」的助推器。

這次抗震救災終於使人們看到了抽象的「人民」搖身一變成為了有社會責任心的「公民」。可以說，1990年代初期在中國展開的有沒有公民社會的追問，建立在中國社會主義黨國體制的一體化中、不存在公民社會想像的前提之上，因此，公民社會或更本土化的民間社會就天然地具有或承擔着瓦解國家一體化的功能。這種討論延續了1980年代以來對於共產黨政權作為專制政府的想像，公民社會於是成為替換1980年代主流的現代化修辭。與此同時，1980年代以來，黨國體制已經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體制改革正在自我瓦解，這就使得對民間社會的呼喚所具有的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批判，在某些情境中變成了對新體制或新主流意識形態的辯護者。

二 公民社會的「公民」想像

在這次抗震救災的「公民」演練中，有兩個成員受到了嚴厲批判：一個是在地震發生之初，因捐款少招致網友指責的萬科集團掌門人王石。其後王石在「博客」上為他的行為進行辯護式回應，進而招致網友更嚴厲的批評，此事在網絡上被稱為「捐贈門」事件；第二個是在媒體一次次地報導災區教師不怕犧牲自我、保護學生的師德典範之時，卻在「博客」上公開發表〈「那一刻地動山搖——5·12汶川地震親歷記」^④，「有理有據地」闡明自己為何要逃跑的都江堰某中學語文老師

范美忠。他的辯護言論引發網友一片嘩然，這就是所謂「范跑跑」事件。

把這樣兩個例子放在一起，看似有些怪誕，畢竟作為公認知名企業領袖的王石與自稱中國最優秀文科教師的范美忠風馬牛不相及。筆者把他們並置起來，不僅僅因為這兩個事件作為抗震救災中最引人注目的「媒體話題」具有相似的傳播學路徑：由網絡上的「博客」引發，然後由紙媒介入，使網絡上的局部事件傳遍整個網絡，繼而引起電視等媒體的「深入」報導；更因為他們因不適當的行為及其事後辯解而被人們批評為不合格的「公民」。他們之間的內在連接恰恰在於為公民社會的理念提供了反面例證(有網友把范美忠的先跑出來與王石作為先富起來的典型在修辭上連接起來，暗示兩個行為之間具有相似的社會及文化邏輯^⑤)。儘管對於他們有着許多泛道德化的指責(尤其是網絡上的帖子如同「大字報」般大鳴大放)，筆者還是把這兩場「汗牛充棟」的口水仗作為一種從負面的角度來對公民身份的確認。這種負面教材或許比那些第一時間捐款、捐血、奔赴災區，以及把生的希望留給學生的教師等正面形象更為有力、有效地確立公民社會以及公民身份的行為規範及道德自律。

具體來說，王石受到批評，並非因為他沒有捐款，而是被認為捐得不夠。這種對於富人、企業家捐款的期待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王石及萬科追加捐款並無償參與災後重建，顯然也是高度認同於這種社會共識的結果。網友的「道德審判式」「逼捐」，也被一些人指責為一種類似於「納粹領導人以國家利益名義逼迫猶太商人捐款」的「仇富心理」^⑥。這究竟是一種左派情結的體現，還是這些網絡上的中產

1980年代以來，黨國體制已經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體制改革正在自我瓦解，使得對民間社會的呼喚所具有的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批判，在某些情境中變成了對新體制或新主流意識形態的辯護者。

在後冷戰的時代，自由、民主、人權早已成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表述，而諸如國際主義等帶有超越性價值的社會主義或者說共產主義的道德價值早已經被污名化。

或準中產階級對於企業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的監督和批評呢？

可以說，這種指責無疑高估了網友的「政治動機」。所謂「仇富心理」，無疑是1980年代以來，對於社會主義歷史的諸多清算方式之一；說得形而上一點，革命動員的邏輯是一種妒恨政治（或仇恨政治學）^⑦。改革開放以來，如何一步步地論證資本的合法性，顯然是198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重建的重要步驟。瀰漫在一種發展主義和新啟蒙主義的氛圍之中，「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進而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想像，成為經濟改革的合法性表述，這時，企業家往往成為改革／下海的先鋒隊員或勇者（1984年下海的王石就是其中的傑出份子）。

伴隨着國家推進或深化市場化改革，受傷害最深的群體是曾經作為社會主義都市中產階層主體的工人階級，階級分化愈來愈嚴重，「公益」漸漸成為一種彌合這種市場化代價的社會修辭。1990年代末期以及新世紀初期，伴隨着「三農問題」的突顯，資本家能否加入共產黨（「三個代表」自身的去階級化表述）的爭論，關於資本／財富合法性的兩種表述（或理念）開始變得有效：一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以及企業家也是社會的納稅人；二是更為大眾化的說法，即強調企業家的公益、慈善價值，也就是要富而有禮、富而有德。經常被媒體報導的全球首富蓋茨（Bill Gates）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家，就是眾人的表率。由此，資本的合法性終於可以借助慈善這塊「遮羞布」來消弭，並進而承認階級分化的合理性。

可以說，慈善成為一種論述資本、財富正當性的必須說辭。在這一

點上，郎咸平的文章〈由賑災捐款引發的歷史文化反思〉^⑧又一次強調了自由市場中的企業家的道德規範，是要把資本／財富以慈善的形式回饋社會。也正是在這個邏輯下，抗震救災期間播出的電視節目《贏在中國》^⑨第三賽季的總決賽，各路已然成功的企業家評委以及「在路上」的創業者所分享的創業動力，被強有力地表述為只有把企業做大做強，才能在國家危難之時，貢獻出更大的力量。資本的合法性論證從來都是通過把資本附着於個人理想、夢想，以及民族與國家的力量等非資本的價值來實現的，這或許比借助「民族」資本的外衣更能獲得大眾的諒解和認同吧。可以說，網友對王石的指責，顯然不是某種階級仇恨，或者說一種左派對於資本的批判，反而是高度認同於慈善、公益事業這樣一個社會共識的前提下，對資本家的一種道德約束。

如果說「捐贈門」事件重新確認了企業家／資本家在這個社會中的合理位置，那麼范美忠作為普通人，他的出現使人們可以評判甚麼才是合格的公民／個人。在〈那一刻地動山搖〉的激揚文字中，范美忠懷着一種被專制強權政治迫害的妄想，對自己為何先跑進行了辯解，其中，最為「鏗鏘有力」的理由是：「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的人。」這句話的有趣之處在於一個「卻」字，為甚麼在范美忠那裏，「自由和公正」與「先人後己勇於犧牲自我」就是相悖的或者說不兼容的呢？這恐怕與冷戰歷史以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有關（這裏暫且不考慮到范美忠有點混亂的知識譜系^⑩）。在這種振振有詞的對立背後，前者代表着「自由、公正、民主」的西

方世界的普世價值，後者代表着「犧牲自我，匯入人民」的或許帶有禁欲色彩的共產主義道德精神。

在後冷戰時代，自由、民主、人權早已成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表述，而諸如國際主義等帶有超越性價值的社會主義或者說共產主義的道德價值早已經被污名化（或者轉換成人道主義話語）。也就是說，這樣兩種價值的對立，恰恰是冷戰時代西方陣營的邏輯在後冷戰時代的延伸。在這一點上，范美忠的自辯與其說是思想異端，不如說是當下最主流的表述。其「鏗鏘有力」及其受政治迫害的妄想本身，再加上被攻擊的悲壯感，其所面對的敵人，恰恰是一隻死老虎，儘管可以看到諸多狐假虎威的幻影。

可以說，王石、范美忠對於社會的冒犯，不是因為他們足夠挑戰了社會常識及其道德底線，而是因為他們做得還不夠。對於王石所維護的慈善路線以及范美忠所堅持的某種在極端狀態下維持個人選擇的自由，應該是這個時代最主流的表述。一個看似毋庸置疑的前提是，王石、范美忠顯然是公民社會的一份子，他們都具有市民的資質。因此，他們恰好是成熟而理想的資本主義主體的兩個面孔——一個是喜歡攀登、勇於挑戰的浮士德式的英雄，一個是「膽怯、自私而自負」^①的個人。

最後，有必要把視野轉向積極參與並成功製造這兩起媒體事件的廣大網友。這兩場爭論，如果不是借助網絡，很難想像網絡媒體已經成為「社會熱點話題」的發源地。據估計，中國網民已超過二億，遍布中國城鄉各地，當然主要是大小城市及發達的城鎮，或者說網友——具有基本的文化

水平和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群體——也是最廣義的公民社會／中產階級的基石，同時也是公民社會所想像的邊界所在。從「三一四」事件中網友對家樂福的抵制以及王石被指責後道歉可以看出，網民或消費者作為消費主體的「力量」（作為房地產和家樂福的消費對象的顯然是城市中產階層或市民），亦即市場邏輯內部的「上帝」，是不能得罪的。

三 公民的主體位置與「愛的奉獻」的霸權效應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我們看到了志願者或民間（公民、市民）社會的力量和作用，民眾自發的救助是如此「強大」和自覺。這次救災的動員效應與其說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傳，不如說是城市市民或者說中產階層自覺的慷慨解囊，一種以人道主義為主體的道德自律如此自覺地被調動起來。如果說「超女比賽」通過「拇指民主」（每個人都有投票權）實踐民間社會的想像，那麼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產階層市民強烈的責任感和道德感，而得以實現這種道德自律的話語是「愛的奉獻」。

《愛的奉獻》是一首流行歌曲，出現在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之後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愛的奉獻」作為一個名詞性短語，如同1990年代中期國企改革攻堅戰中出現的社會文化表述「分享艱難」一樣，非常巧妙地迴避了主體與客體的位置。「分享艱難」並沒有說出「誰」分享「誰的」艱難，似乎「分享艱難」不言自明地具有主體和客體，但是這個短語本身卻把市場化進程中被剝奪者（下崗工人）承受國家改

從「三一四」事件中網友對家樂福的抵制以及王石被指責後道歉可以看出，網民或消費者作為消費主體的「力量」，亦即市場邏輯內部的「上帝」，是不能得罪的。

從電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獻愛心的人幾乎都是城市市民，農村／農民依然在這種市民空間想像之外，也就是說，農村／農民已然不在捐款、「愛的奉獻」的想像的共同體裏面。

革代價的問題（也常常被描述為轉型期的「陣痛」）轉化為讓「人民」來分享「國家」艱難的一種有效詢喚。「愛的奉獻」也是如此，「誰的」愛奉獻給「誰」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不需要說出的前提，如果說後者／客體是災民，那麼前者／主體又是誰呢？是你，是我，是他，還是電視機前的觀眾？「愛的奉獻」恰恰要空出這樣一個主體位置等着你、我、他來由衷地填充，恐怕很少有人會把自己放置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吧。

在這種道德撫慰中，我們不會去想地震發生的合理性（如果是天災就更方便赦免對人禍的追問），反而認同於在災害的前提下，我們作為救助者去拯救災民。可是，「人人」都是奉獻者，這裏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嗎？這種中產階級道德依然是有邊界的，正如上面提到中產階級屬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民階層，市場的邊界也是中產階級的邊界。從電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獻愛心的人幾乎都是城市市民，農村／農民依然在這種市民空間想像之外，也就是說，農村／農民已然不在捐款、「愛的奉獻」的想像的共同體裏面。

這種「愛的奉獻」的話語成為一種社會共識，還不在於作為準中產階級主體的城市市民被這種話語所整合，而在於這種意識獲得了其他階層，尤其是被統治階層的由衷的、發自內心的認同，使人們意識不到或者說不能當下就意識到這是某個階層的訴求。下面筆者試圖從兩個方面來論述「愛的奉獻」所預留出的主體位置是如何被非中產階級的底層民眾以及作為中產階級預備軍的「80後」所分享的，以說明這種話語所具有的整合力和霸權效應。

地震後網絡上有一篇關於「非震區災民」的帖子^②，是有關一個工廠工人為自己沒有捐款而感到愧疚。之所以沒有去捐款是因為他看到災民的伙食「標準」比自己所在工廠的正式工人還要高，「災民一天的生活費比我兩天的還多」，但是，「我一直覺得心裏很糾結，不捐錢好像欠了誰的。難道我不是一個善良的人嗎？我也曾自願地跑到血站去獻血。我為大災流了無數的眼淚」。作者如此強烈的自責和自省意識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是甚麼令作者造成如此大的愧疚感呢（帖子的敘述很像宗教懺悔，說出自己「犯罪」的過程也就是獲得或求得赦免的過程）？

帖子的第一句話是「第一次在電視看到災情，我吃了一驚，繼而看到救災，感到安慰與感動，每每在電視前淚流滿面」，電視以及電視中的災情和救災場面使作者感受了一種捐款的壓迫感和情感的強制力。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電視／傳媒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所發揮的巨大而成功的動員或詢喚效果，「不捐款就會造成良心自責」。或許不需要網友對富豪的「逼捐」，普通人也自覺地感到道德壓力。

而問題的有趣之處在於，這份自責來自一個工廠工人。按照作者的敘述，僅從災民的伙食對比中，就可以看出他是比災民更受「災」的群體。如果真是如此的話，帖子的敘述者本人也應該是被救助的群體才對，可是作者為甚麼偏偏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需要被幫助的人，反而為自己無法成為捐款者（也就是去幫助別人的人）而深深愧疚呢？這恰恰就是「愛的奉獻」等人道主義話語自身所建構的主體位置，也就是說，「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愛的奉獻」所強調的是「獻

出」，而不是接受，作為奉獻的接受者在這種敘述中是居於客體的位置，而不是主體位置。因此，帖子的敘述者為自己無法填充或滿足這樣一個必須「獻出」的主體位置而深深地感到自責和焦慮。

如果說「非震區災民」因對這套話語的認同而自責，反而呈現了他從屬於低下階層的身份，那麼「80後」在這次抗震救災中，「終於」獲得一雪惡名的契機。「80後」不僅踴躍參與獻血、捐錢、捐物，更以個人或志願者組織的形式趕赴災區直接參與救災。其中參加抗震救災的解放軍、武警部隊、醫療隊中也有許多是「80後」，「80後志願者成為四川抗震救災志願者的中堅力量」^⑩。這種對於「80後」的正面評價並非始於這次大地震，而是年初的南方雪災；到了3月份「反藏獨，護聖火」的活動中，「80後的愛國情」被極大地激發出來（包括海外的「80後」）。香港的《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盛讚愛國主義重塑「80後」一代^⑪；媒體上還有「『80後』領導全球愛國行動，中華後繼有人」^⑫的美譽。

可以說，「80後」走向成熟的標誌是一種「愛國情」，恰如「Anti-CNN」網站的創建者所說，「如果沒有國家就沒有我們的幸福生活」。如果說這種「愛國情」，在3月份網絡上的「愛中國」紅心大聯合中，還有時被指責為民族主義的雜音^⑬，那麼在抗震救災中，「80後」的「愛國情」就很少被指責為一種受到國家動員／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了。「80後」從「特立獨行」的個人主義姿態轉變為或整合為於中國（國家／政府／社會）或祖國高度認同的主體的變化，變成了「80後」的自覺、自願和成熟。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危機時刻，或者說動員的時代裏，個體是如何主動地、自願地吸納到國家、民族、祖國等認同之上的，就連似乎被認為是在個人主義的養料中成長的「80後」，也可以「輕易地」被「收編」。就像「志願者」這樣一個有着明確方向性的身份一樣，「我」是自願的^⑭。這種「80後」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熱情，與其說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遺產，不如說更類似於美國式的建立在個人（英雄）主義基礎上的愛國主義。這與「80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未來城市裏的準中產階級的身份認同密不可分，因此，他們「自然」具有一種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價值的中產階級道德自律。

可以說，這種建立在人性、人道主義基礎上的以捐款捐物為行動指南的意識形態性，不在於要求富人、有錢人、中產階層去獻出愛心，而是那些顯然是低下階層或非中產階級的人們也要由衷地認同於這樣一種敘述，並把這種敘述邏輯內在化，這也就證明了這樣一套話語自身是如此地具有整合力和動員效果。

說到這裏，就不得不進一步追問，究竟為甚麼這樣一套老話語會「煥發出新顏」呢？這套話語之所以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與當下中國社會結構的固化有關。如果說1990年代中期，中國還處在階層極速分化的過程，那麼最近一兩年，似乎這種社會結構的分化已經完成，人們很清楚自己處在甚麼樣的位置上。就像帖子中的工廠工人，他分享了這種中產階級的陳詞濫調，儘管他也從電視新聞報導中看到了自己實際上處在比災民還要差的一種階級位置上，但是他無法也不能對這種中產階級話語提出甚麼異議或不同的視角，反而是把自己放

「愛的奉獻」這套話語之所以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與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的固化有關。如果說1990年代中期，中國還處在階層極速分化的過程，那麼最近一兩年，似乎這種社會結構的分化已經完成。

伴隨着官方陸續公布嘉獎令以及各種抗震救災英模事迹報告會的舉辦，經歷一個月的「抗震救災」逐漸在媒體中消失。作為一次媒體事件的大地震，已經落下了帷幕。

在要去捐款的位置上。(這種意識形態與階級位置的錯位是否說明了另外一個老說法，從自在的階級變成自為的階級需要「先鋒黨／知識份子」來灌輸或植入呢?)

這種話語的有效性，不在於中國的中產階級有沒有形成，或者說人數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而在於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成為大眾媒體(顯然，沒有市場化的農村不在這個「大眾」裏面)所竭力建構的社會共識。中國雖然沒有80%的中產階級，但並不妨礙以中國大小城市為市場邊界的社會把中產階級的價值作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在社會階級分化已經完成的今天，使得這種「愛的奉獻」的話語得以成為社會各個階級所分享的霸權表述。

四 結語

抗震救災進入災後重建的階段，電視媒體雖然已經由24小時滾動播出(其實只有中央電視台如此，其他電視台都是轉播)恢復正常，但不幸的是，地震帶來的次生災害依然縈繞着電視機前、電腦前的觀眾、網民(或者說「公眾」)的脆弱而又充滿良知的「心」。伴隨着官方陸續公布嘉獎令以及各種抗震救災英模事迹報告會的舉辦，經歷一個月的「抗震救災」逐漸在媒體中慢慢消失。學生早就開始復課，旅遊區開始恢復開放，久久牽掛人心的失事直升機也「最終」被找到。可以說，無論媒體如何持續地關注災區，作為一次媒體事件的大地震，已經落下了帷幕。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以「愛的奉獻」為核心的人道主義話語，成為填充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市民社會想像

的位置，這種話語成為社會的和諧之音，在彌合階級鴻溝或許說修正妒恨政治學的同時，也印證着中國社會結構分化的固化或完成。借助抗震救災這一突發事件，得到演練的或暫時獲得想像的公民社會只展現了其溫情的一面，距離可以充當政治抗爭空間的民主化遠景還相當遙遠。在這種未完成的狀態中，批判性的思考究竟應該為之鼓而呼，還是呈現公民社會自身的壓抑性或遮蔽性呢?

註釋

① 〈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偉大的透明和國家的成人禮——災難時刻的信息傳播〉，《新周刊》，第276期，2008年5月19日提前出版。

② 〈全民總動員見證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北京青年報》，2008年5月21日。

③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頁29。

④ 范美忠：〈那一刻地動山搖——5·12汶川地震親歷記〉，2008年5月22日，天涯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32774&PostID=13984999&idWriter=0&Key=0。

⑤ 雲淡水暖：〈析「范跑跑」：「先跑出來」與「先富起來」的異同〉，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0291/7341471.html>。

⑥ 朱大可：〈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關於汶川地震的反省與問責〉，2008年5月26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_01009zy5.html。

⑦ 台灣學者趙剛在〈跳出妒恨的認同政治，進入解放的培力政治——串聯尼采和激進民主〉一文中，對尼采所批評的妒恨政治進行了正面回應，並提出走出妒恨政治的方式是

培力政治。參見趙剛：《知識之錨：當代社會理論的重建》（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07-42。

⑧ 郎咸平：〈由賑災捐款引發的歷史文化反思〉，2008年5月23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20db8b01009dgs.html。

⑨ 以「勵志照亮人生，創業改變命運」為口號的電視創業節目《贏在中國》，參賽選手都是剛剛起步的創業者，獲勝者可以贏得風險投資，相比一般的選秀節目或「PK」比賽，《贏在中國》更凸顯贏者何以為贏，輸者何以為輸的市場邏輯或現實邏輯，因為評委都是這個時代的最成功者（如蒙牛集團總裁牛根生、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腦白金神話史玉柱等），贏者的位置是確定的，是毋庸置疑的。

⑩ 范美忠：〈「關天茶舍」給一般中學老師的思想類書目〉，2003年11月7日，天涯社區，<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74621.shtml>。

⑪ 借用自學者黃應全對范美忠的精彩分析。參見黃應全：〈汶川大地震證明儒家「性善論」了嗎？——「范跑跑」事件的是非及倫理學啟示〉，2008年6月10日，學術中國，www.xschina.org/show.php?id=12455。

⑫ 鄉下小妖1979：〈大災了，我流了很多淚，沒有捐一分錢，大家來鄙視我吧〉，2008年5月23日，天涯社區，<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268045.shtml>。

⑬ 〈80後志願者成為四川抗震救災志願者的中堅力量〉，《成都日報》，2008年5月21日。

⑭ 〈香港《南華早報》：愛國主義重塑「80後」一代〉，2008年5月7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5/07/content_8121115.htm。

⑮ 申富強：〈「80後」領導全球愛國行動，中華後繼有人〉，2008年5月8日，鳳凰博報，<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40347.html>。

⑯ 「民族主義」成為一個負面詞語本身是意味深長的，作為以民族國家為核心單位的國際秩序，無論怎

麼說，民族主義都是其認同的基本或有機組成部分。如果說「民族主義」被扭曲成一種排外的、自我封閉的、烏合之眾的代名詞，那麼如何討論二十世紀50、60年代出現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合法性呢？或者說對民族主義的妖魔化本身，是不是對這段歷史的一種負面書寫的一部分呢？

⑰ 在這裏，可以追究一下「志願者」為甚麼會成為一種有效的身份認同。「『志願者』是英文Volunteer的中文譯法，也被譯做『義工』。志願服務起源於十九世紀西方國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務，在世界上已經存在和發展了100多年。核心精神是『自願、利他、不計報酬』，「志願者」概念從上個世紀80年代引入中國，並以1993年12月5日中國青年志願者協會的成立為標誌性事件」（中國社區志願者網，<http://220.113.41.237/2005/9-14/143920-2.shtml>）。這些說法顯然更強調志願者服務的西方源頭以及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標誌，而與人們的記憶更相關的是「志願」所引起的聯想，是抗美援朝時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是入黨、入團志願書中所填寫的「我志願加入……」。從中國志願者網（www.zgzyz.org.cn）上查到的關於志願者服務精神的實踐者是雷鋒精神和白求恩（Henry N. Bethune）的國際主義精神，這或許是志願者精神的本土脈絡，與其說這是雷鋒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在志願者服務中的延續，不如說借助「志願者服務」這樣一個詞彙，把雷鋒精神中的共產主義戰士的道德典範和國際主義精神轉化為一種人道主義敘述；或者說「我志願」中「志願」是一個動作，加上「者」這個助詞就變成名詞了，也就是說「我志願」的對象就消失了，我志願做甚麼不重要了；或者說，「志願者」是「志願」的名詞化，同時也是志願的對象，即「我志願成為志願者」，「志願」本身就是「志願」，多麼好的同義反覆啊！

張慧瑜 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